

敦煌學郎抄寫〈秦婦吟〉的目的與意義

黃亭瑋*

摘要

本文以〈秦婦吟〉現存十四個寫本（P.3381、P.3780、P.3910、P.3953、S.692、羽 57R、P.2700、S.5834、S.5476、S.5477、Дх.10740、Дх.4758、Дх.4568、Дх.6176）作為焦點，藉由題記、字跡推測抄寫者之身分及抄寫目的。就寫本抄寫狀態來看，這些寫本應由兩種不同學習階段之人所抄，本文將其分為「初學者」與「進階學習者」進行討論。兩種學習階段的學郎雖皆抄寫〈秦婦吟〉這首詩，卻不一定擁有相同目的，初學者透過〈秦婦吟〉學習韻文，進階學習者除了詩文學習以外，更有抄書換取錢糧之行為。在〈秦婦吟〉所有寫本中，僅有約一半能確定抄者身分，其餘則可透過字跡推測抄寫者的學習程度。〈秦婦吟〉寫本大抵為進階學習者所抄，偶有初學者以〈秦婦吟〉作為習作內容。《北夢瑣言》中雖提及韋莊忌諱〈秦婦吟〉，然從〈秦婦吟〉留下的寫本數量、橫跨年代、抄寫目的來看，都可發現〈秦婦吟〉於當時具一定流通性與價值。

關鍵詞：〈秦婦吟〉、寫本、學郎、敦煌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學生。

一、前言

〈秦婦吟〉為韋莊之作，藉著「秦婦」口吻敘述晚唐黃巢起義時之社會亂象，作成一首長篇敘事詩。此作品在敦煌寫本被發現前亡失許久，失傳的原因如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言：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¹

韋莊避諱此詩，因此其詩集未收，故失傳多年。而後敦煌寫本被發現，王國維先生在檢讀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所錄「斯坦因部分劫經」時，發現一前後殘缺、無篇名、無作者之長詩。其於比對《北夢瑣言》後，發現此長詩應為韋莊所作之〈秦婦吟〉，並於 1920 年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再於 1924 年在《北大國學季刊》發表〈韋莊的〈秦婦吟〉校本〉。除王國維先生外，羅振玉先生亦於 1909 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又於 1924 年互校張龜、安友盛兩寫本（P.3381、S.692），將〈秦婦吟〉全文印入《敦煌零拾》。²

至於近代學者對於〈秦婦吟〉寫本的研究，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³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⁴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⁵〈〈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⁶等皆對寫本進行整理與分析。此外，西方學者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亦於《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中細節討論〈秦婦吟〉寫本，有些內容雖有待商榷，卻也提供寫本研究新的視野。⁷筆者觀察寫本後發現，多有學郎抄寫〈秦婦吟〉，且抄寫者似乎為不同學習階段。本文將先整理〈秦婦吟〉現存所有寫本，再將可知抄者身分的寫本分成「初學者抄本」、「進階學習者抄本」兩部分，根據寫本的題記、抄寫內容

¹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4 月），頁 47。

² 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8 號（1920 年），頁 95-100。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東方雜誌》第 10 期（1909 年），頁 42-46。

³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頁 230-234。

⁴ 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85-190。

⁵ 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14 年第 4 期），頁 153-161。

⁶ 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5 期），頁 81-92。

⁷ 〔美〕倪建著、馮乃希譯：《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頁 33-73。

與〈秦婦吟〉詩歌內容進行分析。

本文擬討論三件事：其一，何以不同學習階段的學郎，都同樣抄寫〈秦婦吟〉？其二，〈秦婦吟〉對於敦煌地區的學郎而言，有何價值與意義？其三，〈秦婦吟〉寫本雖無法得知所有抄寫者的身分，還是能藉由字跡推測出抄者是為「初學者」，抑或是「進階學習者」。因此，筆者除了討論可知抄者身分的寫本，亦會推測抄者不明的寫本是由何種學習階段之學郎所抄，以此回顧所有〈秦婦吟〉寫本，探討不同學習階段的敦煌學郎抄寫〈秦婦吟〉的目的與意義。

二、〈秦婦吟〉寫本敘錄

整合徐俊、張涌泉等學者說法，〈秦婦吟〉現存寫本共十四個，分別為 P.3381、P.3780、P.3910、P.3953、S.692、羽 57R、⁸P.2700、S.5834、S.5476、S.5477、Дх.10740、Дх.4758、Дх.4568、Дх.6176。其中 S.692、羽 57R 可互相綴合，P.2700、S.5834 可互相綴合，Дх.10740 與 Дх.4758 可互相綴合。⁹後文將分別寫為羽 57R+S.692、P.2700+S.5834、Дх.10740+Дх.4758。以下整理〈秦婦吟〉寫本相關資訊，列於下表一中：

表一 〈秦婦吟〉寫本資訊整理

	編號	抄寫者	抄寫年代	裝幀方式	有無題記
1	P.3381	張龜	天復五年(905)	卷軸裝	有
2	P.3780	馬富德	顯德四年(957)	卷軸裝	有
3	羽 57R+S.692	安友盛	貞明五年(919)	卷軸裝	有
4	P.2700+S.5834	不明	貞明六年(920)	卷軸裝	有
5	P.3953	不明	不明	卷軸裝	無
6	P.3910	陰奴兒	太平興國四年 (979)	冊葉裝	有
7	S.5477	陰奴兒	不明	冊葉裝	無

⁸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提及，其中一個〈秦婦吟〉寫本為「李盛鐸原藏本，未見」，於註釋中寫道：「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載《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散〇二四六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第五七號著錄，見榮新江〈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偽〉，《敦煌學輯刊》一九九七年第二期。」。(頁 232) 徐俊未見此卷，而張涌泉在〈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中提到：「羽 57R，首全尾缺，首題『秦婦吟一卷』，有『敦煌石室秘笈』、『木齋真賞』、『李盛鐸印』、『李滂』四印。卷背有『見光明寺學郎索受成』、『千字文』字樣。此號各家皆未入校。」兩者皆提及此寫本為李盛鐸所藏的〈秦婦吟〉相關寫本，徐俊所言之「散〇二四六號」應為張涌泉所言之「羽 57R」。

⁹ 見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87-190。

8	S.5476	不明	不明	冊葉裝	無
9	Дх.10740 + Дх.4758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10	Дх.4568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11	Дх.6176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P.3381 正面僅抄寫〈秦婦吟〉一詩，卷軸裝。全詩俱全，每行約二十字，畫有烏絲欄。首、尾皆題「秦婦吟一卷」，留有題記「天復五年（905）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背面抄有「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中和」，字跡與正面不同。

P.3780 正面抄寫〈秦婦吟〉，多處破損，卷軸裝。每行約二十八字，畫有烏絲欄。首題「秦婦吟一卷 右補闕□」，尾題「秦婦吟一卷」，留有題記「顯德二（四）年（957）丁巳歲二月十七就家孝士郎馬富德書記」、「手若筆惡若有決錯名書見者決丈五索」。尾題與題記間雜有「顯德二（四）年（957）丁巳（巳）歲二月□□□□□□□□□□」、「濕德□□□□□顯德二年二月」，題記後抄有「德九 止歲歲學九九」、「大周顯德四年（957）丁巳（巳）歲二月十九日學士童見馬富德書記」、「大同顯德四年丁」等句。

羽 57R + S.692 經綴合後首尾俱全，正面抄寫〈秦婦吟〉，卷軸裝。每行約十八字。首尾皆題「秦婦吟一卷」，留有題記「一米欽鑪」、「貞明伍年（919）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寫記」、「今日書寫了合有五升米高代不可得環是自身災」等句。

P.2700 + S.5834 綴合後仍有缺漏，P.2700 在「東鄰有女眉新畫」至「梁上懸屍已作灰」、「自從洛下屯師旅」至「夜宿霜中臥荻花」、「妾聞此父傷心語」至「詠此長歌獻相公」三段有所缺漏，與 S.5834 綴合後補足後兩段之缺字。每行約十九字，畫有烏絲欄，卷軸裝。首題「秦婦吟一卷 右補闕韋莊撰」，留有題記「貞明陸年歲在庚辰拾貳月」。背面抄有「龍興寺」、「普光寺」、「大雲寺」、「金光明寺」、「靈圖寺」等寺名。

P.3953 首尾均殘，卷軸裝。每行約二十一字，僅抄錄「暮見喧呼來酒市」至「妾聞此語愁更愁」。

P.3910 為冊葉裝，於首頁寫有「己卯年（979）正月十八日陰奴兒買策子」。此寫本不僅抄寫〈秦婦吟〉，於〈秦婦吟〉前抄有「茶酒論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壹拾壹首」、「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一十一首」等內容。每行約十二字，畫有烏絲欄。首題「秦婦吟 補闕韋莊撰」，自「中和癸卯春三月」抄至「城外烽煙無寒（塞）色」，後寫有「癸未年二月六日淨土寺彌趙員住左手遺（書）」、「癸未

年二月六日淨土寺趙趙訛」等句。

S.5477 為冊葉裝，抄寫〈秦婦吟〉「斜開鸞鏡懶梳頭」至「詠此歌獻相公意」，尾題「秦婦吟一卷」。每行約十二字，畫有烏絲欄。文中寫有「陰奴兒」三字。

S.5476 為冊葉裝，抄寫〈秦婦吟〉「忽見門外起紅塵」至「旋叫魔鬼傍鄉村」。自「獨展蛾眉出門去」後字跡出現變化，應有他人一起抄寫。每行約九字，畫有烏絲欄。

Дх.10740+Дх.4758、Дх.4568、Дх.6176 為殘片，部分內容為〈秦婦吟〉，尚抄有〈鷹賦〉、〈開蒙要訓〉、〈晏子賦〉等篇章。¹⁰

十一個寫本中，共五個留有題記，可透過題記、考證得知其抄寫年代介於天復五年至太平興國四年間。¹¹此外，共五個寫本可透過題記得知抄者身分，分別為金光明寺學仕郎張龜（P.3381）、學士郎馬富德（P.3780）、汜孔目學郎陰奴兒（P.3910、S.5477）、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羽 57R+S.692）。目前可確認抄者身分之寫本皆為學郎所抄，抄寫年代落於晚唐至北宋之間。根據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所言，敦煌地區當時有州學、縣學、鄉學、道學、寺學等學校，為學郎進行經學、史學、文書教育與詩文教育，¹²〈秦婦吟〉作為一篇歷史長篇詩歌，確實適合作為教材，為學郎提供詩文教育。¹³

田衛衛先生在〈〈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¹⁴中，已闡述敦煌學郎學習〈秦婦吟〉之因，然而文中有兩點須再斟酌：其一，作者認為〈秦婦吟〉是俗文學作品；其二，作者認為〈秦婦吟〉寫本字跡大多拙劣，基本可確定皆為初學者所書。針對第一點而言，〈秦婦吟〉應為文人詩作，故不能以學習俗文學的角度理解。至於寫本字跡，若觀察所有寫本，可以發現有些〈秦婦吟〉寫本字跡相當端正，如 P.3381、P.3780 皆是如此。

¹⁰ 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5 期），頁 89-91。

¹¹ P.3381、P.3780、P.3953、羽 57R+S.692、P.2700+S.5834 皆可透過題記得知抄寫年代，而 P.3910、S.5477 未明確寫有抄寫年代，便須經過考證。徐俊先生提到，P.3910 卷首寫有「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陰奴兒買策子」一句，又陰奴兒另一寫本 S.5441 中，留下一題記「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四月十七日，汜孔目學仕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故可推論 P.3910 抄寫的時間是在「太平興國四年」。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臺北：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頁 431-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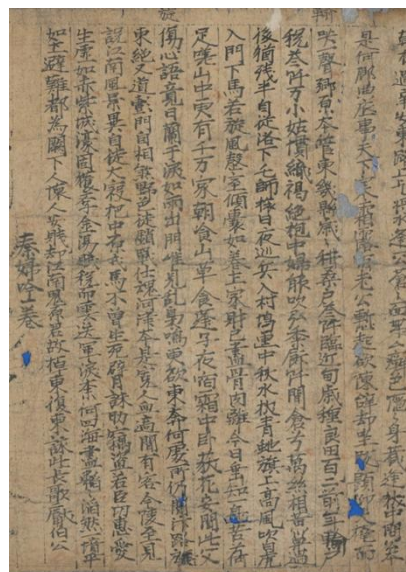
¹² 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158-187。

¹³ 朱鳳玉先生提到，敦煌寫本中的詠物詩、詠史詩、風物詩、訓誡詩皆具教育功能。參朱鳳玉：〈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敦煌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9-16。

¹⁴ 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文獻》（雙月刊）第 5 期（2015 年 9 月），頁 9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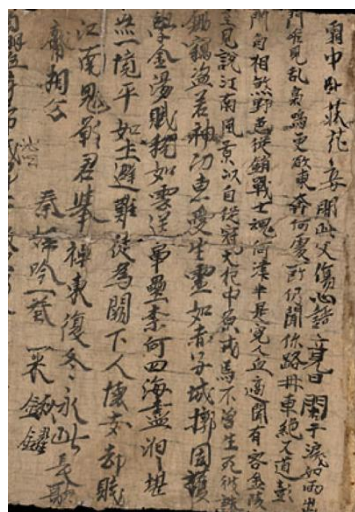


圖一 P.3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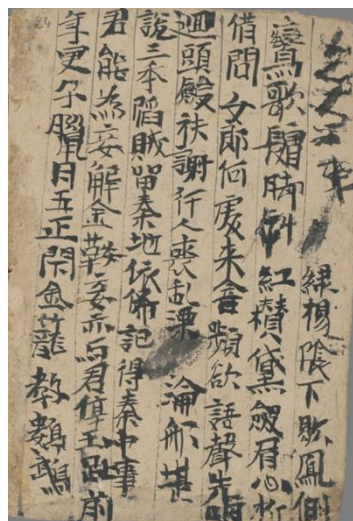


圖二 P.3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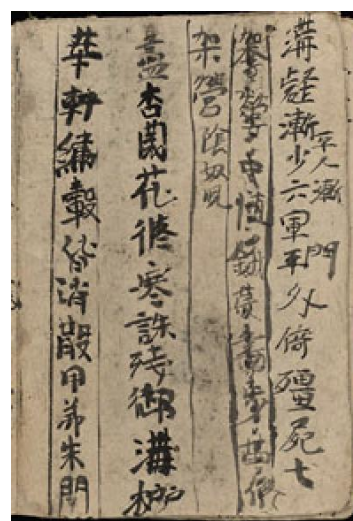
筆者認為〈秦婦吟〉寫本可能由兩種不同學習階段之人抄寫，可初步分為「初學者」與「進階學習者」討論。若僅以字跡分類則太過主觀，筆者分類的依據除了觀察字跡以外，亦觀察寫本的抄寫狀態。「進階學習者」抄寫狀況會較為完整，字句、行距皆較密，如圖一、圖二、圖三；而「初學者」則較常有缺漏之處，且時有塗改、塗鴉的情形，如圖四、圖五。可比較羽 57R+S.692（圖三）、P.3910（圖四）、S.5477（圖五）三寫本：57R+S.692 字跡雖不甚端正，字句歪斜，然字句、行距密，少有缺漏字；P.3910、S.5477 字跡大，字句、行距較寬，且文字歪斜，似乎尚不能掌握運筆方式，內文塗改、污損處多。



圖三 羽 57R+S.692



圖四 P.3910



圖五 S.5477

就寫本抄寫狀態來看，P.3381、P.3780、羽 57R+S.692 三個寫本的抄寫者，可能

是已有一段學習經驗的學郎，而 P.3910、S.5477 抄寫字跡則較稚嫩，可能是初學者。若可看出〈秦婦吟〉由不同學習階段學郎抄寫，則寫本抄寫目的應有所不同，故應將不同程度的學郎所抄之寫本分開討論。

三、初學者抄寫〈秦婦吟〉

一般而言，已有學習經驗之人，無論字跡優劣，皆可看出其對文字筆畫的掌握度較高。而初學者則不同，即便字跡端正，也可以看出模仿字帖的痕跡，且字型結構通常較鬆散，對筆畫的掌握度不高。初學者抄寫〈秦婦吟〉的寫本為 P.3910、S.5477，此二寫本的字跡大致端正，然而運筆方式像是初拿毛筆之人。寫本字體大小不均，又常有錯字、闕漏字，時而重複抄字，且有塗鴉痕跡。此外，寫本中畫有烏絲欄，抄者並未完全對齊欄線，時有字句歪斜情形。透過上述觀察，可推論抄寫 P.3910、S.5477 之人為初學者。

P.3910 在最前頁寫有「己卯年（979）正月十八日陰奴兒買策子」一句，比對此句與後文的字跡，可知此寫本的抄寫者為陰奴兒。其抄寫〈秦婦吟〉時，從首句抄至「城外烽煙無寒（塞）色」一句便停，後面留有「癸末年（983）二月六日淨土寺彌趙員住左手遺」、「癸末年（983）二月六日淨土寺趙趙訖」兩句。根據徐俊先生考證，此兩句並非陰奴兒所抄。¹⁵S.5477 也抄寫〈秦婦吟〉，其自「斜開鸞鏡懶梳頭」抄至全詩結束，並抄有尾題「秦婦吟一卷」。此寫本在「六軍門外倚僵尸，七架營中填餓殍」兩句之間寫有「陰奴兒」三字，比對 P.3910 的字跡、抄寫方式，推論出 S.5477 亦為陰奴兒所抄。

陰奴兒的身分為「汜孔目學郎」，然此身分卻因 P.3910 抄寫的內容而有討論空間。徐俊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提到：

在所有敦煌詩卷中，伯三九一〇最具講唱底本的特徵。敦煌講唱作品寫本，通常都有「前題」與「後題」（或稱「尾題」）。伯三九一〇卷所有各篇，〈茶酒論〉後題作「茶酒論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後題作「新合千文一卷」，〈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後題作「新合孝經一卷」。後題的存在對作品完整性和文書起迄的確定提供了可信的依據，但亦帶來了一些麻煩，因為敦煌講唱作品文書中實際上存在著以第一件文書的題目，作為其後數件作品的後題的現象，如本卷的「新合孝經一卷」，後題之前、〈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之後，即有與〈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內容明顯不同的「聽張騫一曲歌」和闕題詩二十一首。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應與當時的講唱習俗

¹⁵ 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432。

有關。¹⁶

陰奴兒在抄寫〈秦婦吟〉之前，尚抄有〈茶酒論〉、〈新合千文皇帝感辭〉、〈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其中在〈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前、後題之間，還抄有「聽張騫一西（曲）歌」、「闕題十三首」、「正月十五夜」、「闕題七首」等詩作。¹⁷徐俊認為 P.3910 是講唱底本，主因是講唱作品通常具備「前題」與「後題（尾題）」，而 P.3910 所抄的內容都有這個現象。不過徐俊也發現一個難解的問題，便是〈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之後，有與此篇章內容明顯不同的「聽張騫一曲歌」和闕題詩二十一首。徐俊大抵上將此現象解釋成講唱底本的特徵，也就是此講唱底本編排了這些作品相互承接。

筆者認為徐俊先生的說法尚有可討論之處。首先，講唱作品通常都有「前題」與「尾題」，不等於有「前題」、「尾題」的作品皆是為了講唱而抄寫。就如〈秦婦吟〉一詩，一般來說非為講唱所用，然而 P.3910 亦抄寫此篇章。當然，寫本前後抄寫的內容不須相關，不過若以「前題」、「尾題」作為講唱底本的證據，陰奴兒抄寫〈秦婦吟〉的另一寫本 S.5477，抄畢也題有「秦婦吟一卷」。其它抄寫〈秦婦吟〉的寫本，如 P.3381、P.3780，也同時抄有前、後題。因此，都有「前題」與「尾題」的現象，不足以證明其為講唱底本。其次，〈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之後，有與此篇章內容明顯不同詩作，徐俊先生將其解釋為講唱底本的特徵，也尚須斟酌。若要作此解釋，應該還要有以下證據：其一，有其它抄寫順序、內容與 P.3910 相同的寫本，且題記說明其用於講唱；其二，有其它資料提到陰奴兒為講唱者。有更多證據後，才能確信這些內容毫不相關的篇章，確有做此安排的目的。

那麼，何以 P.3910 前、後題之間抄寫的內容並不相關？或許可從一名學郎學習、聽講的角度切入。在〈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前、後題之間，先後抄有〈新合孝經皇帝感辭〉、〈聽張騫一曲歌〉與闕題詩二十一首。¹⁸這些詩作中，有一點值得注意：許多字抄成當時音近、音同之字。如〈聽張騫一曲歌〉中，「今朝得遇西王母」，「得」抄成「德」，「喚取嵇康來撫琴」，「撫」抄成「武」；又如闕題詩第三首中，「翩翩黃鳥處幽谿」，「翩翩」抄成「篇篇」；再如闕題詩第五首「比來諸心亂紛紛」，「紛紛」抄成「芬分」；第六首中「楊柳園中不忘君」，「楊」抄成「陽」。抄寫底本的過程中，不太可能發生此現象，而更可能出現在老師口傳授課時。較無學習經驗的學生，在進行聽講、抄寫時，由於對文字掌握度不高，故發生寫成同音、音近字的狀況。

¹⁶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432。

¹⁷ P.3910 寫本中未寫有「聽張騫一西（曲）歌」、「闕題十三首」、「正月十五夜」、「闕題七首」等詩題，題目皆為徐俊訂定，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頁 435-440。

¹⁸ 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頁 435-440。

除此之外，也可以觀察陰奴兒抄寫〈新合孝經皇帝感辭〉的方式。陰奴兒在詩句與句之間，留有一個空格，此應為先生講詩的停頓點。除了同一首詩有此情形，不同首詩之間也僅以空格隔開，幾乎看不出詩歌的開始與結束之處。〈新合孝經皇帝感辭〉、〈聽張騫一曲歌〉、闕題詩二十一首之間抄寫連貫，又抄於〈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前、後題之間，確實會認為這些詩歌彼此有所關聯。不過，學郎在聽講期間難免分心，在詩歌闕題的情況下，如果老師持續誦讀，學生極可能聽漏。加上作為初學者，對詩歌掌握度不高，在前面抄了長篇韻文的情況下，很可能認為這些詩作皆為同一個作品而持續抄寫，直至講學結束，才寫下「新合孝經一卷」作為尾題。

除了抄寫的內容與方式之外，也可以透過 P.3910、S.5477 抄寫的媒介，推測出陰奴兒的學郎身分。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中提到：

冊葉裝與卷軸裝最主要的差異，就在於前者較輕巧，便於攜帶，……。（除了方便佛教徒誦經外，也有許多學郎用其抄寫）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學郎所抄寫的冊葉，應是師長要學郎抄錄下來的，一方面是習作，一方面又可做為教本，與佛教徒一樣，學郎也需要比卷軸裝輕巧方便的裝幀形式，況且，既然是習作亦毋須那般鄭重其事地以卷軸裝為之，故冊葉裝也就因此出現了。¹⁹

如上文所言，冊葉裝的特點為「輕巧、便於攜帶」，除了方便佛教徒隨時誦經，也方便學郎攜帶至學塾抄寫，類似於現今筆記簿的使用。筆者認為 P.3910、S.5477 非講唱底本的原因有二：其一，冊葉裝篇幅較小，常須翻頁，會造成講唱過程不流暢；其二，寫本抄寫過程中，時有塗改、塗鴉、畫記情形，並不方便閱讀。相較於卷軸本裝幀的正式性，冊葉裝更具筆記性質，也更可能作學郎抄寫之用。

陰奴兒除了抄寫 P.3910、S.5477，還在兩個寫本中留有相關訊息，其一為 S.5441，其二為 S.5256V。S.5441 抄有〈捉季布傳文〉、〈王梵志詩集卷中〉，²⁰並在〈捉季布傳文〉正文後，留有「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四月十日記汜孔目學仕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一句。觀察 S.5441 可以發現，其中字跡並不相同。根據首頁留下的內容「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二月廿五日陰奴兒書記」、「戊寅年二月十七日田繼長李應紹陰驢子三人……」等句子，可以推測陰奴兒與他人合抄。S.5441

¹⁹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3 月），頁 62-63。

²⁰ S.5441 寫本中，〈王梵志詩集卷中〉抄有〈吾家多有田〉、〈借貸不交通〉、〈道士頭側方〉、〈觀內有婦人〉、〈道人頭兀雷〉、〈寺內數箇尼〉、〈生即巧風吹〉、〈佐史非臺補〉、〈得錢自喫用〉、〈當鄉何物貴〉、〈村頭語戶主〉、〈人生一代間〉、〈受報人中生〉、〈愚人癡涇涇〉、〈机机貪生業〉、〈世間何物貴〉、〈世間慵懶人〉、〈家中漸漸貧〉等十八首詩。

中究竟有多少人進行抄寫、抄寫段落分別為何，須仔細比對過字跡差異後才能判斷。不過從字跡與題記來看，可以確定陰奴兒參與了〈捉季布傳文〉、〈王梵志詩集卷中〉部分內容抄寫。

S.5256V 為一殘片，²¹寫有「戊寅年（978）四月五日陰奴兒寫經一卷，〈百鳥名〉壹卷，〈百行章〉一卷」，未抄有其它內容。於此有三種可能：其一，陰奴兒只寫此句，不寫其它內容；其二，陰奴兒於卷背再次抄寫此句話；其三，他人看見陰奴兒的寫本，隨手抄下此句於某個寫本背面。根據陰奴兒的抄寫習慣，這句話應會如 P.3910、S.5477、S.5441 一般，抄於冊葉裝寫本中，並抄於正文附近。S.5256V 抄寫的這句話，更像是某人隨手抄於寫本背面的雜寫。至於是否為陰奴兒本人所抄，由於只留下一句話，且字跡與其它內容略有差異，考慮到初學者抄寫的不穩定性，無法輕易下定論。然而可以得知，陰奴兒除了 P.3910、S.5477、S.5441 三個寫本以外，尚抄有其它內容，且抄寫時間十分接近。

陰奴兒抄寫的時間分別為「己卯年（979）正月十八日以後」²²（抄於 P.3910 首頁）、「太平興國三年（978）戊寅歲二月廿五日」（抄於 S.5441 首頁）、「太平興國三年（978）戊寅歲四月十日」（抄於 S.5441 〈捉季布傳文〉正文後）、「戊寅年（978）四月五日」（S.5256V）。後三個時段相當接近，尤其〈捉季布傳文〉與 S.5256V，抄寫時間甚至只差了五日。P.3910 雖僅以干支紀年，然從字跡落差不大推斷，P.3910 中的「己卯年」應為「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的下一年，也就是「太平興國四年（979）」。這些寫本於兩年內進行抄寫，因此可將寫本提到的內容，視為同一個學習階段所抄寫的文章進行討論。陰奴兒在太平興國三、四年所抄的內容，按照順序應為某經文、〈百鳥名〉、〈百行章〉、〈捉季布傳文〉、〈王梵志詩集卷中〉、〈茶酒論〉、〈新合千文皇帝感辭〉、〈新合孝經皇帝感辭〉、闕題詩二十一首、〈秦婦吟〉，而以上作品皆為「韻文」。

根據陰奴兒「汜孔目學郎」的身分、學齡進行推測，這些內容很可能是陰奴兒的課本。老師透過韻文易於朗誦的特點，進行童蒙教學。學郎能學習較易讀懂的俗文學作品，如〈茶酒論〉、〈捉季布傳文〉；或學習篇幅較短的詩作，如抄於〈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後的二十一首詩作；或學習如〈百行章〉、王梵志詩等具蒙書或教化性質的韻文。而〈秦婦吟〉雖為文人詩文，然用詞較為淺俗，或許與〈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後的二十一首詩作一樣，也能用作童蒙學習之用。可以注意的是，〈秦婦吟〉抄寫順序最晚，且抄寫狀況不佳。陰奴兒並未一次抄完此詩，且抄寫過程中時有塗鴉、墨痕、不清楚的字跡、錯漏字、內容塗改與重複抄寫等

²¹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卷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8。

²² P.3910 所抄的內容為「己卯年（979）正月十八日陰奴兒買策子」，而買策子的時間不一定等於抄寫的時間，然而可以確定抄寫時間必為己卯年正月十八日之後。

情形。〈秦婦吟〉可視為韻文學習之下，較為進階的學習內容。比起其它文章，陰奴兒較無法掌握此篇詩文，故於抄寫過程中較不精細。

四、進階學習者抄寫〈秦婦吟〉

大部分寫本僅寫有所抄的文章，時而留下題記，說明抄寫的目的、時間、名字、身分。本文所探討的五個寫本，就留下了「天復五年（905）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P.3381）、「顯德二（四）年（957）丁巳歲二月十七」（P.3780）、「貞明伍年（919）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羽 57R+S.692）等時間，「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P.3381）、「就家孝士郎馬富德」（P.3780）、「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羽 57R+S.692）等身分、姓名。根據以上內容，最多只能得知抄寫者於家學、寺學中學習，並於此日抄寫〈秦婦吟〉這首詩歌，題記並未確切寫下抄寫者的年紀，也未有相關資料足以得知抄寫者的學齡。不過，抄寫者的學齡其實有跡可循，雖未能得知確切年齡，至少可以定位此學郎的學習階段為初學，抑或是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若能得知此事，便有後續討論的空間。

一般而言，已有一定學習經驗的學郎，字跡會較端正。無論字跡優劣，皆可看出抄者對於文字筆畫的掌握度較高，字跡較整齊且一致，頗具行氣。檢視寫本後，筆者認定應為進階學習者的寫本為 P.3381、P.3780、羽 57R+S.692。以上寫本中，字跡不一定十分優美，然而從筆畫與行氣來看，可以看出的確為具備一定學習經驗的學郎。以下將分別透過這三個寫本的抄寫狀態與題記內容，分析進階學習者抄寫〈秦婦吟〉的目的與意義。

首先是 P.3381，卷軸裝，整卷寫本僅抄寫〈秦婦吟〉一詩，首尾皆題「秦婦吟一卷」。字跡端正、優美，每行約二十字，畫有微微烏絲欄，抄寫得十分整齊。除因寫本破損而造成的闕漏字以外，整體幾乎無錯字、漏字。偶有寫漏之時，則以小字將所漏之字寫於字與字之間的空隙，全然不影響閱讀。此寫本為〈秦婦吟〉寫本中最清晰、完整的寫本，抄寫者在學習上應已花費不少功夫，可以判斷其應非初學，而是已學習一段時間的進階學習者。P.3381 除了是最完整的寫本之外，亦為最接近〈秦婦吟〉寫作年代的寫本。根據〈秦婦吟〉詩文首句所言，韋莊作詩於「中和癸卯春三月」，是為唐僖宗三年，而 P.3381 題記寫道：「天復五年（905）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根據史書，天復為唐昭宗年號，時有天復元年（901）至天復三年（903），天復四年（904）即改元天祐元年，²³應不會有天復五年（905）的年號。關於這點，李正宇先生在〈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提到：

²³ 根據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2000 年 10 月），頁 771-778，天復三年最後寫道「全忠將逼車駕幸洛陽，懼亂、濬立異也。」接著便改元「天祐元年」。

天復四年閏四月十日改元天祐，自此始，本當書天祐年號，但敦煌仍用天復年號。天祐二年四月到天祐三年四月（905—906），一度行用天祐年號，但天祐三年下半年又改用天復年號，一直用到天復十年（910）。金光明寺學始見於是年。²⁴

由上可知，敦煌地區與唐朝年號並不一致，前者使用天復年號至天復十年為止。不過依然可知 P.3381 所抄之天復五年，接續於唐昭宗以後的年代，因此可以推得 P.3381 抄寫之時，是為韋莊作〈秦婦吟〉後二十多年。P.3381 僅留有與抄寫時間、地點、身分相關的題記，未可知其抄寫目的。因此針對此寫本，僅能斷定其為一名金光明寺的進階學習者。

第二個寫本為 P.3780，亦為卷軸裝，整卷寫本僅抄寫〈秦婦吟〉，字跡端正，書寫方式整齊，每行約抄寫二十五字，畫有烏絲欄。整卷除了前半部紙張缺損造成的闕漏字，幾乎無抄寫錯誤、漏字的情形。若有寫錯字，有些不會塗改，而會訂正於旁邊。如「七架營中填餓殍」寫成「七賈營」，便於「賈」旁邊再寫一個「架」。若是有經過塗改的錯字，便會寫於每行最上方留白之處。除了錯字訂正以外，抄寫者亦有在字旁注音的情形，如在「餓殍」的「殍」旁邊，就寫了「音眇」。P.3780 的抄寫者在正文中除了訂正錯字、加寫注音之外，沒有寫下其它無關於詩文的字句。根據以上的訊息，可以看出 P.3780 亦由進階學習者進行抄寫。

此寫本亦留有題記，內容為「顯德二（四）年（957）丁巳歲二月十七就家孝士郎馬富德書記」、「手若筆惡，多有決錯，名書見者，決丈五索。」。除了交代抄寫〈秦婦吟〉的時間與身分之外，更寫有一首與抄寫作業的心情有關的打油詩。這首詩經校錄後的正確內容應為「手弱筆惡，多有闕錯，名書見者，決杖五索。」²⁵朱鳳玉先生在〈敦煌學郎詩抄析論〉中提及，相似的詩作還出現於 P.3322，寫的是「首（手）弱筆惡，多有厥錯。名師見者，即以卻□」，寫於庚辰年正月十七日。此詩是一首流行於敦煌學郎的小詩，表達學郎害怕被老師懲罰而努力抄寫的心情。²⁶P.3780 的學郎之所以抄寫這首詩，很可能如朱鳳玉先生所言，是學郎害怕受到懲罰而鞭策自己的語句。由於其寫下的詩中，有許多同音、音近的錯字，因此這首詩很可能是透過口傳、非正式（無抄寫底本）的方式流傳。而從其寫下此詩來看，也可知〈秦婦吟〉為學郎的學習教材。

除了學郎於題記留下的打油詩之外，P.3780 尚有其它值得注意之處，便是其

²⁴ 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頁 30。

²⁵ 見張涌泉：〈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188。

²⁶ 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2。

留有許多他人抄寫的字跡。有些與 P.3780 抄寫者馬富德所抄的內容有關，如在尾題「秦婦吟一卷」與題記「顯德二（四）年（957）丁巳歲二月十七就家學士郎馬富德書記」之間，有一潦草字跡，抄有「顯德二年丁巳歲二月□□□□□□」、「濕德□□顯德□□」。下筆隨性，內容有許多塗改之處，應為某人心血來潮抄寫前方內容的行為。又如題記「手弱筆惡，多有闕錯，名師見者，決杖五索」之後，寫有「德、九、歲、學」、「大周顯德四年（957）丁巳歲二月十九日學士童兒馬富德書記」、「大周顯德四年丁」等內容。字跡端正，「九」字、「歲」字皆有重複抄寫的情形，「歲」字更有拆字抄寫的情形，可以看出本段應為他人練字之用。

P.3780V 也有部分字句與正文相關的內容。如某人先寫一句「大周顯德四年（957）丁巳歲九月□□日就家學士郎馬富德書記」，再寫「崔氏夫人訓女文」，後寫下〈崔氏夫人訓女文〉內文的幾個字「香車寶馬」。此情形有可能是某人作為習字之用，最後未繼續抄寫。特別的是，P.3780V 也出現與正面內容無關的字句，如「西州」、「西州侯頭長弼胡言道某乙明日無□」、「丙子年五月十五日學士郎楊定遷自手書記之耳也」、「大雲之寺」、「南無東方佛」、「南無」、「南無十方仏傳」、「丙子年五月十五日小次張文成到此索僧政院內見海神角蘭喏以以以身体」、「神角蘭喏以以以身体」等內容。「丙子年」與正文題記留下的「丁巳年」最少應相差四十一年。雖然這些內容寫於背面，且相當片段，但是就這些字跡、內容與 P.3780 正文的差異來看，P.3780 很可能傳於多人之手。〈秦婦吟〉是否依然作為學習用途無從得知，然而從他人在多年後依然會在寫本背後寫下字句來看，可以知道此卷的內容具有保存的價值。

最後一個寫本由羽 57R、S.692 綴合而成，一樣是卷軸裝形式。整卷寫本僅抄寫〈秦婦吟〉，首尾皆題「秦婦吟一卷」。字跡並不端正，每行約抄寫十八字，畫有烏絲欄。行與行之間距離並不一致，時而緊湊時而鬆散。此寫本雖字跡不佳，然從其運筆方式來看，字型結構緊湊，可看出此寫本是進階學習者所抄。羽 57R + S.692 亦留有題記，內容為「貞明伍年（919）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侍郎安友盛寫記」、「今日書寫了，合有五升米，高代（貸）不可得，環（還）是自身災」兩段話。

前一句說明抄寫的日期以及抄寫者的身分，後句則說明了其抄寫目的，是為了貼補生活才進行抄書的悲苦。除了這句話以外，還留有「一米銚鑼」四個字於尾題「秦婦吟一卷」之後。因為內容片段，無法確認這四個字所想表達的真正意涵。然而根據題記的第二句話，可以推測與其抄書換米貼補家用有關聯。朱鳳玉先生在〈敦煌學郎詩抄析論〉中提到：

此詩可窺見敦煌學郎為了避免向人借取高利貸，而以幫人抄書計酬貼補生活的實際情形。此可與敦煌寫卷的抄書手所抄的書寫種類與流傳的情形相

互印證。²⁷

從題記的內容中，可以看出其抄書換取糧食的用途。除了可以此推測抄寫羽 57R + S.692 的學郎家境不佳，就如朱鳳玉先生後句所言，這句話可與抄書手所抄的種類、流傳情形相互印證。〈秦婦吟〉在當代必然有一定的流通程度以及重要性，才能具有抄寫賣錢的價值。

總結上述內容，可以確定對於進階學習者而言，抄寫〈秦婦吟〉具有兩個目的：其一，作為詩文學習之用，如 P.3780 寫下的打油詩，學郎以抄寫〈秦婦吟〉作為習作，寫下鞭策自己認真抄寫的詩作；其二，抄寫〈秦婦吟〉以換取錢財、糧食，如羽 57R + S.692 題記所寫，「今日書寫了，合有五升米」。除了得知進階學習者的抄寫目的之外，還能透過題記看出其它訊息：〈秦婦吟〉在當時具一定流通性。就這三個寫本而言，〈秦婦吟〉的抄寫年代自韋莊作詩後二十多年，橫跨至後周顯德四年，流通的時間並不短。且從其能夠抄書計酬來看，可以推測〈秦婦吟〉於當時有傳抄需求，才有換取錢財的價值。

五、結論

本文以確定抄寫身分的寫本作為主要討論對象，檢視寫本的字跡等內容後，觀察出兩種學習階段（初學者、進階學習者）的學郎皆抄寫〈秦婦吟〉這首詩。不同學習階段的學郎，雖然抄寫同樣的內容，卻不一定是相同的目的。如同現今進行詩歌教學時，也會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使用相同的文本。而幼時學習詩文的著重點，與長大後學習詩文的著重點，必有所不同。目前〈秦婦吟〉的寫本中，能夠得知抄者身分的寫本共五個，分別為 P.3381、P.3780、P.3910、羽 57R + S.692、S.5477，且這些抄寫者身分皆為學郎。

筆者透過寫本字跡、抄寫狀態，將這五位學郎分為初學者、進階學習者進行討論。張龜（P.3381）、馬富德（P.3780）、安友盛（羽 57R + S.692）為進階學習者，這三位抄寫者對文字筆畫掌握度高，基本上無錯字、漏字。除了正文的抄寫以外，有時還會留下抄書的心得，如 P.3780 題記所寫的打油詩。陰奴兒（P.3910、S.5477）是一名初學者，對文字筆畫掌握度相對低，常有錯漏字、塗鴉痕跡，且字句時有歪斜的情形。經過整理、分析後得出，〈秦婦吟〉對於敦煌學郎而言，大部分作為學習教材，也有學郎抄寫〈秦婦吟〉以換取酬勞（如羽 57R + S.692）。不同學習階段的學郎，學習〈秦婦吟〉的目的並不相同：對於初學者（P.3910、S.5477）來說，可以用於韻文學習；對於進階學習者（P.3381、P.3780、羽 57R +

²⁷ 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3。

S.692) 而言，則可對詩文內容有進一步的學習。不論是初學者抑或是進階學習者，〈秦婦吟〉都具有詩文學習的價值。而從學郎抄寫〈秦婦吟〉，並以此換取酬勞來看，也可看出〈秦婦吟〉在當時具一定流通性，有傳播的價值。

〈秦婦吟〉寫本共有十一個（綴合後），有些雖為殘片，卻也能從數量上看見〈秦婦吟〉存在抄寫的價值。〈秦婦吟〉寫本中，能知道抄寫年代者共五個：P.3381，抄於天復五年（905）；P.3780，抄於顯德四年（957）；羽 57R + S.692，抄於貞明五年（919）；P.2700 + S.5834，抄於貞明六年（920）；P.3910，抄於太平興國四年（979）。這五個寫本流通的時段，自韋莊作詩後二十多年，經過後梁、後周至宋初，前後經歷七十多年。在〈秦婦吟〉的所有寫本中，僅五個能確定抄者身分，雖不知其餘六個寫本抄者身分為何，也能透過字跡推測出抄寫者的學習程度。以下整理所有〈秦婦吟〉寫本的編號、抄寫者、抄寫年代、裝幀方式以及抄寫者身分於表二中，並對抄寫者未知的寫本稍作分析，推測其抄者身分。

表二 〈秦婦吟〉寫本資訊及抄者身分

	編號	抄寫者	抄寫年代	裝幀方式	抄者身分
1	P.3381	張龜	天復五年（905）	卷軸裝	進階學習者
2	P.3780	馬富德	顯德四年（957）	卷軸裝	進階學習者
3	羽 57R + S.692	安友盛	貞明五年（919）	卷軸裝	進階學習者
4	P.3910	陰奴兒	太平興國四年（979）	冊葉裝	初學者
5	S.5477	陰奴兒	不明	冊葉裝	初學者
6	P.2700 + S.5834	不明	貞明六年（920）	卷軸裝	進階學習者
7	P.3953	不明	不明	卷軸裝	進階學習者
8	S.5476	不明	不明	冊葉裝	初學者
9	Дх.10740 + Дх.4758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進階學習者
10	Дх.4568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進階學習者
11	Дх.6176 (殘片)	不明	不明	不明	進階學習者

表二序號 1 至 5 的寫本已於前文討論過，於此不再贅述，下文將針對序號 6 至 11 之寫本進行分析。P.2700 可與 S.5834 綴合，P.2700 寫有前題，S.5834 留有題記「貞明陸年歲在庚辰拾貳月」。寫本中輕畫烏絲欄，且字跡工整，非初學者所抄。P.3953 字跡雖不佳然工整，可看出亦非初學者所抄。S.5476 為冊葉裝，寫

本中畫有明顯烏絲欄，前後字跡變化大，「獨展蛾眉出門去」一句前，應為初學者所抄。Дx.10740+Дx.4758 雖為殘片，然可看到寫本中畫有明顯烏絲欄，字跡端正工整，應為進階學習者所抄。Дx.4568 為殘片，字跡雖不佳然工整，留有「今朝到此寺壁上亭書字」一句，可看出應為進階學習者所抄。Дx.6176 亦為殘片，寫本中輕畫烏絲欄，字跡不佳然工整，亦可看出非初學者所抄。

由上可知，大部分〈秦婦吟〉寫本為進階學習者所抄，偶爾也有初學者以〈秦婦吟〉作為習作內容。《北夢瑣言》中雖提及韋莊忌諱〈秦婦吟〉，且「撰家戒不許垂〈秦婦吟〉障子」，然從〈秦婦吟〉留下的寫本數量、橫跨年代、抄寫目的來看，都可發現〈秦婦吟〉於當時具一定流通性與價值。〈秦婦吟〉寫本的發現，不只能夠恢復〈秦婦吟〉詩文的原貌，更可透過寫本中真實的書寫內容，看出一個地區、一段時間中，某些人抄寫〈秦婦吟〉的目的，此為〈秦婦吟〉寫本具備的另一個意義。

徵引書目

（一）專著

- 〔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臺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4 月。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任海天：《韋莊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 朱鳳玉：《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 汪泛舟：《敦煌古代兒童課本》，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周紹良：《敦煌文學作品選》，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
- 屈直敏：《敦煌文獻與中古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 年 1 月。
-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
-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
- 柴劍虹：《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高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9 月。
- 張涌泉：《張涌泉敦煌文獻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
- 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3 月。
-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2000 年 10 月。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 〔美〕倪建著、馮乃希譯：《有詩自唐來：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二）期刊論文

- 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8 號，1920 年，頁 95-100。
- 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2014 年第 4 期，頁 153-161。
- 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文獻》（雙月刊）第 5 期，2015 年 9 月，頁 90-100。
- 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2015 年第 5 期，頁 81-92。
- 朱鳳玉：〈敦煌詩歌寫本原生態及文本功能析論〉，《敦煌研究》，2018 年第 1 期。
- 李正宇：〈唐宋時期的敦煌學校〉，《敦煌研究》1986 年第 1 期，頁 39-47。
- 李正宇：〈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頁 26-40。
- 高國藩：〈敦煌本〈秦婦吟〉新論〉，《許昌師專學報》1987 年第 3 期，頁 60-64。
- 張新朋：〈敦煌詩賦殘片拾遺〉，《敦煌研究》2011 年第 5 期，頁 77-81。
- 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偽〉，《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頁 1-18。
- 潘重規：〈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序〉，《敦煌學》1984 年第 8 期，頁 71-114。
- 羅振玉：〈敦煌石室及發見之原始〉，《東方雜誌》1909 年第 10 期，頁 42-46。

（三）網路資源

-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網址：<https://idp.bl.uk/>，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9 日。